



一个学生的学校

尽管只有一个学生,但跟其他拥有成百上千学生的学校一样,这里的一切运行都严格遵循着规定。没有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,学校的所有事务都由中心小学直接管理。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值日表,罗修应负责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校园卫生,剩下两天由于学全负责。

成百上千学生的学校一样,这里的一切运行都严格遵循着规定。没有校长和其他管理人员,学校的所有事务都由中心小学直接管理。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值日表,罗修应负责每周一、三、五的校园卫生,剩下两天由于学全负责。

每到新学期开学,两位老师都会骑着电动车,跑上几公里山路到中心小学领新发的课本和教具。期末的时候,他们也会去领统一出题的试卷和《致家长的一封信》。每天的记录表上,“应到人数”和“实到人数”后面总是认认真真写着“1”。

“不听话”的学生

维持这一个人的学校并不容易。在三桥村,魏少锋是出了名的“不听话”。每堂课40分钟,他的注意力只能维持大约10分钟,上一会儿课,就要跑出去打球。他在课上爱吃零食,玩手机,夏天太热,就把衣服和鞋子都脱掉,赤脚踩在地上。

他经常嬉皮笑脸地冲老师喊自己在网上学的“三字经”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不交作业是好汉！”网络几乎是他们通往外界的唯一方式。学校里没有英语

课,他就自己在手机上看直播视频时学了几句“Hello”“apple”“Thank you”,还有几句骂人的话。

两位老师都已年过60,面对学生的任性,他们大多时候只能在每周的记录表上无奈地写上“讲学无效”,最生气的时候,也只是在后面详细地记下魏少锋干的“坏事”,比如“上午学生玩气枪,打老师,没有上课。”记录表会定期送到中心小学,但面对这个调皮的孩子的,没人能想出更有效的管理方式。

在狮子镇,只有几个学生甚至没有学生的学校并不罕见。现今中心小学管理的9所学校中,6所有学生,3所没有学生。人数最多的学校也不超过200人。

没有老师接任的下学期

罗修应和于学全每人每月的返聘工资只有800元。几乎每天,他们都要骑上电动车,从县城一路到村里,去给魏少锋上课。狮子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周兰亭粗略算了下,为了维持这所学校运转,中心小学一年就要花费上万元。中心小学校长于德江说,因为孩子太调

皮,年轻老师根本不敢接任,怕管不了,还有人说“如果派我去,我就辞职”。

来三桥村之前,罗修应满怀信心地想,自己“连40多人的大班都带过,1个人的班还带不了吗”。他是狮子镇人,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当老师,至今已有40多年教龄,在好几个小学当过校长。

可来了没多久,他就不想干了。“要是孩子出点什么问题,谁敢承担这个责任?”每次在安全工作责任状上签下自己名字时,罗修应心里总是有些发慌。

但是罗修应也有舍不得的地方。在这所空旷的学校,于学全会在体育课上帮魏少锋做仰卧起坐。音乐课上,罗修应会用手机给魏少锋播放儿歌,俩人还会对唱。魏少锋嗓子不错,他说自己将来想成为一名“歌唱家”。课文也朗读得很好,教语文的于学全说他“有轻重缓急,表情到位”。只有两把椅子时,魏少锋会让老师先坐。知道他经常不吃早饭,老师会顺路带些吃的。

只是有时,魏少锋会把球扔在一边,嘟囔着“我一个人不好玩”。大部分时候,他唯一的玩伴是村里一只白色的小狗。每当中心小学举办集体活动,他总是特别兴奋,央求老师带他走上几十分钟的山路,只是为了跟同伴们玩上半天。

考完试后,魏少锋的又一个学期要结束了。于学全在犹豫,自己下个学期还要不要来上课。“压力太大。”他说,“我真担心自己的名誉会毁在这个孩子身上。”罗修应也说不不好,他有高血压,不能经常生气。

魏少锋并不知道这些,考完试又去找村里那条小狗玩。他说过自己不想读书,也不想考大学,“没用”。他以后想当歌星,赚了钱就带着父亲离开这里,去城里住。

但是无论如何,下个学期学校还是会为这个唯一的学生开门。等到春天开学,他还是会再次站在升旗台下,把右手高举过头顶。唯一长久陪伴他的,是那根高高竖着的旗杆。据《中国青年报》

寻子等待的29年

29年前,张彩霞从西安周至县来西安市区探亲时,小儿子张天浩(化名)在门外玩耍时失踪,苦寻无果的张彩霞就在失踪地附近的医院干起了保洁员——她怕儿子回来后找不到她。

没想到一等就是二十多年。

失踪时那个只有5岁的小儿子,如今已经变成了三个子女的父亲。而张彩霞也从扎马尾辫的青涩村妇,变成了一位50多岁的脸上长了皱纹的奶奶。

寻

张彩霞今年50多岁,留短发,她眼睛时常眯成一条线,两抹眉毛淡淡的,上下眼睑,额头已能看到明显的皱纹。

张天浩走失那年,她才20多岁,家庭合照里,她留着中分的发型,扎着马尾辫,颇显青涩。

那时,张彩霞的丈夫张建昆刚从西安周至县来到西安市区,接父辈的班在一家出版社发行科做事。张彩霞则没有工作,平时在周至照着小儿子。小儿子有个年长一岁的哥哥张天哲(化名),在西安上小学一年级,由婆婆照顾。

因父亲生病在西安住院,张彩霞便

从周至县前来探亲,住在公婆家。小儿子的消失,让张彩霞在西安市区扎了根。

夫妻俩住过马路边,吃泡面,因为不愿意向亲戚朋友借钱,有时边找边打散工。每次出门寻子,张彩霞都高兴,但一次次的无果,又令她倍受打击。

由于找孩子开销大,再加上不稳定的收入,以及大儿子正在上学,夫妻俩不得不放弃主动寻找。

夫妻俩曾经的一位毛姓邻居记得,只要说起小儿子,张彩霞的态度总是很坚决:“我娃丢不了的,会回来的。等他长大了回来寻我,总有一天他会回来寻我。”

等

张彩霞坚信,只有在天桥附近等,小儿子回来才能找到家。

上世纪90年代,张彩霞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(以下简称“交大二附院”)找到一份保洁员的工作,负责皮肤病院住院部的环境卫生。

这是一家三甲医院,从这里走到张天浩当年可能的丢失地——人行天桥,只有不到500米。进医院工作后,张彩霞从未离开过,一做就是二十几年。住处倒是多次更改,最远离单位5公里,张彩霞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。

皮肤病院的医生和护士换了好几批,医院的保洁公司也换了好几回,她却一直在这里上班,就是要等孩子回来找她。

她对照看孩子有了心理阴影。有一次不得不帮忙照看大孙子,忙完家务一扭头,没看到人,就像当年丢小儿子一样,吓出一身冷汗,从此再也不敢帮任何人看孩子。

在同事的印象中,张彩霞很少主动提丢孩子的事,有时无意中聊起来,她会哭,坚称要在医院继续做下去,等孩子回来。

错

当张彩霞在医院等着小儿子时,张天浩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新乡原阳县慢慢长大。张天浩的养母后来向警方讲述:某一年的农历二月初二,她在附近合作社碰到一名大约60岁的老人,称自己孩子多,没能力抚养,要把孩子卖掉。她便用2300元买下男孩,起名为李某立。新家庭里,他排行老三,有一个心脏有问题的哥哥,还有一个姐姐,父母都是面朝黄土的农民。

尽管张彩霞坚称小儿子能自己找回来,实际上李某立几乎丢失了所有的幼年记忆,唯一剩下的记忆只有一座模糊的人行天桥,还有一个去世的老人,都不确定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后期,李某立初中只读了一年便辍了学,到公司给人打工。

据李某立回忆,一次他和同村人发生争执,对方指责他并非本地人,村里人便开

始议论纷纷。

大约5年前,李某立开始在网上发消息找亲生母亲,也是在5年前,西安北大街上,张天浩失踪地附近的那座人行天桥因城市建设规划被拆。张彩霞回家路过,站在一旁看,愣了很久。

李某立所在的公司倒闭后,他成为一名货运司机。因工作关系,他曾四五次途经西安,最近时离张彩霞只有几公里。

后来,李某立在河南娶了妻,陆续有了三个孩子。没多久,张彩霞大儿子张天哲也在西安完婚。

据邻居理发店老板娘杨女士回忆,大儿子结婚后,张彩霞的情绪“好了一点”,但仍经常整夜失眠,只好半夜开灯坐在家里,或者干脆起身到天桥上去张望,“怕娃回来找不到门”。

认

去年10月,李某立接到辖区派出所电话,要他参加河南省的统一血样采集普查。

采完血样不久,西安警方便收到公安部的一份血样DNA比对结果,显示李某立很可能就是张天浩。警方通知张建昆和张彩霞再次采血,准备前往河南调查。

尽管警方没有透露采血的真实原因,张建昆还是托在公安系统工作的亲戚打听到消息,但他没敢告诉张彩霞。

一个多月后,2月12日,腊月二十七,陕西省公安厅鉴定结果敲定:DNA比对无误。

张彩霞这才知道,小儿子真的找到了。她埋怨张建昆一直瞒着她,事实上她早就通过丈夫打电话猜得八九不离十,“我不傻,只是这个娃丢了,把我气得,所以这脸看着瓜不唧唧的(意为笨、傻)”。

当晚,家里亲戚都来了。张彩霞把衣服换好,又犹豫不决,担心河南家里不情愿,给小儿子脸色看。小儿子打来电话,“你们别管

这事,我心里有数,这事我说了算”。最后,张建昆、张天哲等5人作为家庭代表连夜开车出发去河南。

因为河南相聚没见到张彩霞,小儿子曾主动发过来一次网络视频。

通话中,小儿子问:“你是不是我妈?”张彩霞答:“是”。两人相看流泪。

时隔29年,一家人终于团聚。

2018年2月23日,大年初八,张彩霞破天荒地去医院请了两天假,她的一头短黑发染了时髦的颜色,衣服看上去崭新而洋气。

当天早上5点,李某立就开车出发了。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和大儿子,从河南新乡去陕西西安见亲生家人。一家人把碰面地点定在辖区西关派出所门前。

多家媒体用镜头记载了这一幕:等待多时的张彩霞一边喊着小儿子的小名,一边向他奔去,将他一把抱住,哭了,她喊着,“你还认不认我,我把你弄丢了”。据澎湃新闻